

图六 黑龙门遗址平面图

豁口或平缓处共发现三十余道石墙，最高一处石墙残高约9米。其中有的石墙顶面平整，高度不足1米，显然不具备防御功能。因此，这些封堵山脊豁口或在平缓处垒筑的石墙和自然山脊一样，是辽祖陵陵园域界的标志，是汉族文化堪輿观念的体现。

2. 陵门(黑龙门) 据《辽史》等文献记述，辽祖陵仅提及一个陵门，即黑龙门。《辽史·地理志》上京道祖州条载：“太祖陵凿山为殿，曰明殿。殿南岭有膳堂，以备时祭。门曰黑龙。”据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辽祖陵陵园仅在东南豁口修筑了唯一的陵门，应是《辽史》所载之黑龙门〔1〕。

黑龙门是辽祖陵唯一的礼仪之门，呈一门三道的格局，体现帝陵的规制(图六)。黑龙门依山为阙，两侧山势陡峭，特别是东侧高入云端，形如阙楼。峭壁之间近90米。陵门朝向为南偏东33度。黑龙门址自东向西分别由东墩台、东门道、东隔墙、中门道、西隔墙、过水涵洞(西门道不存)和西墩台组成。门址墩台和隔墙由夯土修筑，外壁下部用石块、上部用青砖包砌。门址南侧墙面(正面)基本平齐，北侧隔墙窄于墩台，即整体呈“凹”字形。东、西墩台南北进深达24、隔墙南北进深18.3米。东墩台内(北)侧有登临陵门的慢道。

黑龙门现存的东门道和中门道均为木过梁式城门，进深18.6米。门道南口外落差较大，均有五瓣蝉翅慢道，独具特色。北口外较平坦。门道基础下铺有土衬石，其上置木地袱，木地袱上有卯口，插有排叉柱。门道中部有保存完好的将军石和门砧石，原来应设双扇版门。东门道东西宽4.68米，地面残损较重，北部发现车辙痕。中门道大体居于整个陵门豁口的中央，中部东西宽为5米。地面均铺沟纹朝上的长方形沟纹砖，磨损较少，保存较好，应是皇帝等通行的御道。西门道已被现代冲沟破坏殆尽，形制不详，下面有一排水涵洞，涵道尚存。

黑龙门隔墙主体为夯土，南北外侧下部包石，上部包砖。东隔墙保存较好，南北进深18.4、东西宽14.2米。隔墙顶面尚存，距南壁包石外地面通高达8米。城门两侧均筑有高大的墩台，内为夯土和石块，南北两侧均有包石。西墩台顶已破坏。东墩台顶面局部铺地砖保存较好，其上存有门楼附属建筑的基础结构，即残存一座面阔三间、进深三间的建筑，开间宽度不一。东侧墩台和隔墙顶部都发现覆盆式石柱础和砖瓦残块，门道内有较多烧毁倒塌的木构梁柱残件等，据此可知，黑龙门墩台之上应有高大的土木混合结构的城门楼及附属建筑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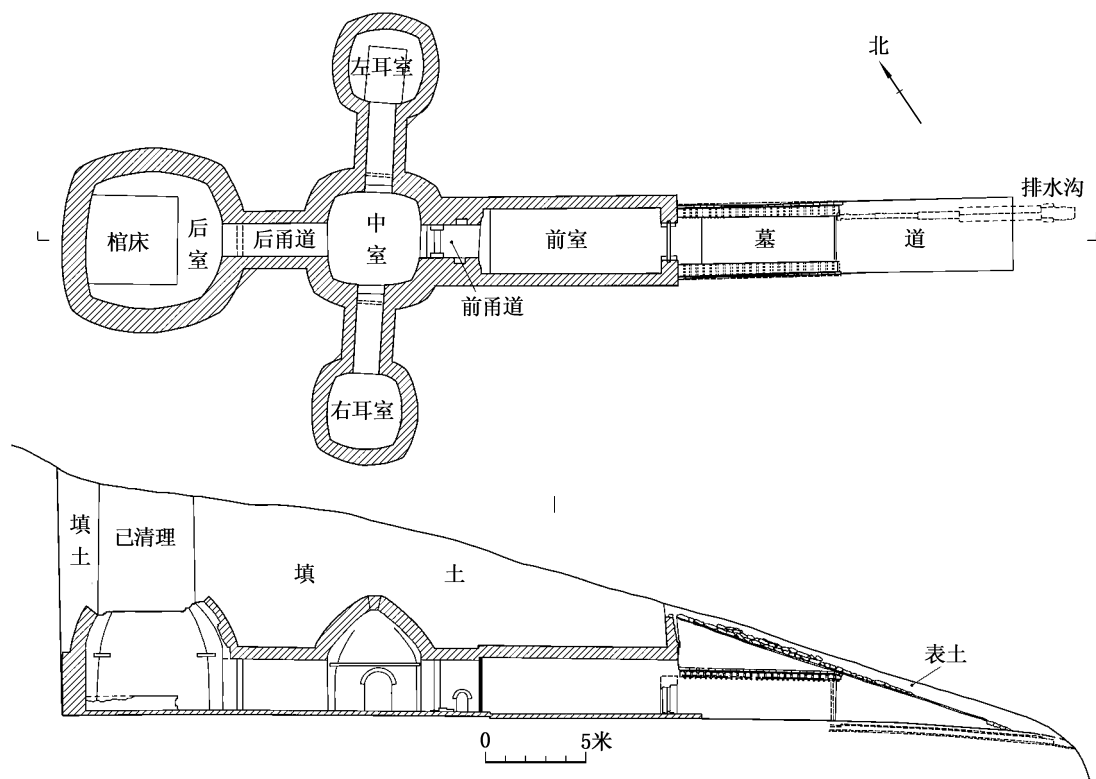
(三)外陵区遗存

通过黑龙门进入陵园的外陵区。外陵区重要的遗存较多，主要有耶律李胡墓及其献殿、佛殿等建筑和膳堂等建筑。

1. 耶律李胡墓 耶律李胡墓(即一号陪葬墓)位于辽太祖陵园内西侧第一道山岭(L1)和第二道山岭(L2,即所谓南岭)之间的谷地〔2〕。墓处在一簸箕形小山坳内的鼻梁骨高地上，三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辽祖陵黑龙门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8年第3期。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祖陵一号陪葬墓》，《考古》2016年第10期。



图七 一号陪葬墓平剖面图

面山岭环抱,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墓道前不远处有一向下的陡坡。墓葬后面的西北部山峰峭立。对面正对太祖陵园东山内壁,峭壁竖立,形如屏风。东山外不远处即祖州城。

耶律李胡墓是一座大型砖筑类屋式墓。由墓道、墓门、前室、前甬道、中室、南耳室、北耳室、后甬道和后室组成(图七),全长 50 米,后室墓底距地表深 12.86 米。墓道朝东南向,方向为 118 度。墓室内地面均铺方砖。墓室内和墓道地面下均有砖砌的排水设施。此墓属于凿山而建。墓道长 17.35、底宽 3.78、最深 5.25 米。底部平缓,上口部分沿自然山脊呈斜坡状。墓道后部两侧各有一个仿木结构砖砌建筑,顶部作单披檐瓦顶,墙壁抹白灰面,前侧面有墨线勾勒的人物图像。两建筑之间的最东端设有一木门。

墓门为券顶,原设有木门,木地袱尚存。前室平面为长方形,弧券顶。东西长 9.05、宽 3.3、高 2.84 米。其后部用十层砖封堵前甬道。前室后壁残存墨绘花卉图案。前甬道前部两侧各有一小壁龛,后端近中室处两侧残存木质门砧。中室、后室和两个耳室均为圆角弧方形,穹窿顶。后甬道内也有数层砖封堵后室,内侧残存木门痕迹。后室东西长 6.75、南北宽 6.85、残高 5.5 米。后室中后部筑有砖筑方形棺床,边长 4.4—4.52、高 0.67 米。棺床三面有彩绘雕砖。其上原应有棺床小帐。

耶律李胡墓埋在陵园西侧，与东北部的辽太祖玄宫仅隔一道山岭(L2)，应是外陵区最重要的建筑之一。此墓前、中、后三正室的形制结构与辽庆陵的东陵基本相同^{〔1〕}，仅墓室数量比帝陵玄宫少两个耳室。根据文献记载，耶律李胡是辽太祖第三子、辽太宗的皇太弟、天下兵马大元帅。李胡用准帝制的五室类屋式墓规制下葬，或许是个特例。

2. 耶律李胡墓献殿 耶律李胡墓献殿(即四号建筑基址)^{〔2〕} 坐落在陵园西侧的第一道山岭(L1)上，位于耶律李胡墓的东南位。

献殿由台基和台基上建筑组成。台基平面近方形，南北面阔 23、东西进深 24.7 米。东、南、北面均有包砖。台基上建筑坐西朝东。由主体建筑、台明、月台和慢道组成。主体建筑面阔五间，进深五间，地面铺方砖。建筑正中建一个长方形内室(F1)，门道朝东，其南北面阔 6.6、东西进深 7.1 米。地面铺砌席纹方砖。四面有砖墙，墙内外均刷白灰面。内室后面和左右两侧分隔成三个独立空间。余下空间呈倒“凹”字形，属于建筑的前堂。台基东面中间砌有一个长方形月台，其中南侧台面边缘有祭祀小坑，出土一组保存完好的祭祀用器(黑釉罐一、白釉小净瓶一、铜钵一、带孔铜器一、铁器三件)。月台中部修筑长慢道，慢道东端为砖砌六边形基座，疑似经幢座。

3. 佛殿等建筑 陵园第二道山岭(L2)东侧有一相对平坦的区域，东南通往陵园山口。区域范围东西宽 53、南北长 68.5 米。地势略有倾斜，西北高，东南低，形成东南部广场。其东侧靠近山根处有由北至南的排水沟。佛殿等祭祀性建筑(即甲组建筑基址)位于东南部广场的中部^{〔3〕}。这是辽祖陵陵园内唯一一组平地起建的大型建筑基址(其他建筑基址基本都在山岭上)，由彼此关联的三个单体建筑构成。基址平面呈“品”字形，建筑坐北朝南。目前在建筑基址的南面没有发现封闭院落的围墙一类设施。

佛殿 佛殿即西建筑基址(2008J1 基址)位于建筑群的西侧。基址坐北朝南，平面呈“凸”字形，包括夯土台基和台上建筑两部分。殿台基平面呈长方形，南侧接有月台。长方形台基东西面阔 17、南北进深 9.5 米。台基东壁、南壁包砖，外抹白灰。西侧和北侧台基面与基岩相平。台基四周有砖铺散水。长方形台基南部有一道单行顺砖，是与南侧月台的分界。南侧月台呈长方形，略低于主体台基台面。踏道位于月台北部东西两侧。台基之上佛殿建筑平面呈长方形，面阔三间，进深四间。当心间柱心距 5.6 米。佛殿残存一段砖砌西墙，宽约 1 米。此建筑可能由砖墙和木板门窗等围合而成，南向开门。室内地面铺方砖。

该建筑使用的雕莲花纹覆盆式柱础，其方形座为一米见方，有些板瓦上线刻罗汉像或刻

〔1〕 田村實造、小林行雄：《慶陵——東モンゴリアにおける遼代帝王陵とその壁畫に關する考古學的調査報告》，東京座右實刊行會，1953 年。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代祖陵陵园黑龙门址和四号建筑基址》，《考古》2011 年第 1 期。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代祖陵陵园遗址》，《考古》2009 年第 7 期。

“佛”字。基址内出土石僧人像、小型残佛像等遗物。据此推定,此佛殿是辽圣宗时期始建或改建的皇家陵寝建筑。

休憩之所 休憩之所即北建筑基址(即 2008J2 基址),基址坐北朝南,由台基和台上建筑组成。台基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面阔 19.6、南北进深 11.6 米。台基南侧中部略偏东筑有三瓣蝉翅慢道。台基上建筑平面呈曲尺形,分东偏房和西正房两部分。东偏房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面阔一间,进深四间。东西面阔 5.82、进深 8.45 米。建筑为单层砖筑墙体,南墙开门,西墙南部有小门与西正房相通。东偏房室内南部二间为土质地面,北部二间为半地穴厨房。半地穴厨房西南角筑一灶台,南部和中部各有灶坑一个。灶台和灶坑北侧半埋二个瓷缸和四个陶罐或瓮等。半地穴地面为卵石铺设,覆盖较厚草木灰,出土残瓷盘、铁剪、铁刀等生活用器和兽骨等。西正房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面阔三间,进深三间。东西面阔 12.7、南北进深 6.95 米。室内沿北、西、南三面墙体筑有火炕,炕面石板上抹有白灰,宽 1.4—1.6、高 0.3 米。室内地面铺方砖。北侧火炕的烟道东端与东偏房的灶膛相通,西端与建筑西北角突出墙外的长方形烟囱相通。南墙封闭,仅东墙南侧设小门与东偏间相通。此建筑的东偏房内设有厨房,正房内三面搭火炕,出土遗物以日常生活用器为主。根据建筑的形制结构和内部设施,以及出土遗物情况推定,此建筑可能是皇亲国戚、达官显贵拜祭辽太祖玄宫时临时下榻休息之所。

生活住址 生活住址即东建筑基址(2008J3 基址)位于建筑群的东侧。建筑基址准确范围不够明确。通过试掘了解到,建筑基址保存不好,建筑也有砖墙和石板火炕等。参考北建筑基址的情况,推测此建筑为陵园内日常管理人员生活居住之所。

4. 膳堂等建筑 陵园内的第二道山岭(L2),西高东低,呈东西向分布。山岭上西部为 200 多米长的人工石墙;而较为平缓的东部就是膳堂等建筑(编为二号建筑基址),位于太祖玄宫封土丘的南侧(图三)。实际上由膳堂(即东高台建筑基址,2009L2J2)、亭台类建筑(即西高台建筑基址,2009L2J1)和轿舆平台(即东平台基址,2009L2J3),以及南侧登山路组成。在膳堂和西侧亭台建筑之间有一低凹的小平台,膳堂和东侧的轿舆平台连为一体。

膳堂 《辽史·太宗本纪》记载,“太祖陵凿山为殿,曰明殿。殿南岭有膳堂,以备时祭”。天显三年(928 年)“五月丙午,建天膳堂”。根据考古调查和试掘资料与《辽史》记载相互印证可知,陵园内第二道山岭应该就是《辽史》之南岭,东高台建筑基址就是《辽史》之膳堂。膳堂位于陵园南岭的东部,其西北正对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玄宫。基址由夯土台基和台上建筑组成。台基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 19.6、南北宽 15.2、高 2 米。南、西、北三面侧壁用石或砖包砌。台基顶面铺方砖或长方形砖,局部发现灶坑和砖墙等现象。具体建筑结构不详。膳堂是辽祖陵十分重要的日常祭祀的献殿。

亭台类建筑 亭台类建筑位于膳堂西侧的高地上。夯土台基西侧与基岩接,其他三面用夯土找平。台基平面略呈方形,东西长 12.4、南北残宽 11.3 米(北边被破坏)。东、南、北三面侧壁包砖。台基顶面铺砖,顶面没有发现建筑遗迹。此处灰坑内发现较多的石雕残块、石人像残块

及少量石构件残块、带字碑块等，以及较多的沟纹砖，而不见瓦类构件。根据考古资料推测此基址可能是一处亭台类建筑。

轿輿平台 轿輿平台址西临膳堂，位于南岭的最东端的小平台上。地势西高东低。东面、南面、北面三面为陡坡。轿輿平台基址东西长 30、南北宽约 10 米。台基东面、南面和北面都有较好的石块垒砌护墙，西面与膳堂连接。现存石护墙东边宽 8、南边长 17、北面长 10 米。根据勘查和试掘可知，台基内为灰褐色垫土，而且台基上面不见有建筑痕迹。此平台基址南侧与曲尺形登山路相连。此处疑为临时停放轿輿或搭建毡帐的地方。

5. 曲尺形登山路 《辽史》所载南岭上的膳堂是日常祭祀耶律阿保机的献殿。根据考古调查可知，南岭的南侧阳坡，有一条曲尺形登山路与山下相连。登山路保存较好，路面北侧为凿山取平，南侧则用石块垒砌找平，南立面整齐。路面较平整，宽 5—6、长约 287 米。

登山路呈曲尺形，分为上下两段。下段从南岭东南山脚下佛殿西侧的牌楼建筑基址（起点），沿慢坡向西而上约 210 米处折拐有平台；上段从拐角平台沿慢坡向东而上约 77 米，到达轿輿平台的南端（终点）。

（四）玄宫及内陵区遗存

通过佛殿和休憩之所后，就进入内陵区，其中最为重要的建筑就是辽太祖玄宫，此外还有番酋像群、祔葬墓献殿等。

1. 辽太祖玄宫〔1〕 辽太祖玄宫是辽祖陵最核心的建筑。《辽史·地理志》上京道祖州条载：

（祖州）有祖山，山有太祖天皇帝庙，御靴尚存。又有龙门、黎谷、液山、液泉、白马、独石、天梯之山。水则南沙河，西液泉。太祖陵凿山为殿，曰明殿。殿南岭有膳堂，以备时祭。门曰黑龙。

通过考古地面调查和试掘，首次从考古学上确认了辽太祖玄宫的准确位置〔2〕。这是辽祖陵遗址考古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辽太祖玄宫位于辽祖陵陵园内陵区，坐落在陵园西侧向东伸出的第三道岭（L3）最东端。第三道山岭居北，从高耸险峻的陵园西垣最高峰向东南蜿蜒盘卧，最东端折曲探伸到陵园中央的位置，犹如卧龙之龙首。

辽太祖陵由凿山为藏的玄宫和巨大的封土丘组成。辽太祖玄宫位于第三道山岭（L3）最东端，玄宫主体是在自然基石山体（即龙首处）的半山腰内，属于典型的凿山为藏。在玄宫的山体

〔1〕 玄宫是皇帝的地下葬所，即一般所述的墓室。根据《唐会要》等文献可知，唐代皇帝地下葬所称玄宫。宋代和清代避讳分别称皇堂和地宫。《辽史·兴宗本纪》载，景福元年六月“乙未，奉大行皇帝梓宫，殓于永安山太平殿”。“闰月辛亥，（兴宗）谒取涂殿，阅玄宫闕器”。故本文将辽太祖地下葬所也称为玄宫。

〔2〕 董新林：《简论辽代祖陵遗址考古发掘及其学术意义》，《东亚都城和帝陵考古与契丹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6年。

之外,是一处人工夯筑痕迹清楚、呈弧面扇形的巨大的封土丘(图四)。封土丘东西弧径约 125、上下斜高约 57 米,是用黄色厚夯土层和砾石块薄层交替分层夯筑而成。这是辽祖陵陵园内唯一的一处规模宏大的人工夯土堆积,其位置大体居于陵园中央。

在太祖陵玄宫封土丘顶部的中后段发现一处特殊的石砌圆孔遗迹。此石孔是用两块凿成半圆形的方形石板对拼成直径为 0.34 米圆孔状,呈弧线形层叠垒砌而成。石板圆孔向西北侧倾斜伸入封土丘中。石孔遗迹是一个重要的现象,可能是太祖陵玄宫前的墓道上重要的设施之一,或许暗示太祖陵玄宫的墓道方向——东南向。

简而言之,太祖陵位于陵园内中央偏后的位置,既属于典型的凿山为藏,玄宫口外有一个高大的扇形封土丘,又具有积土为藏的特点,形制独特。玄宫墓道方向可能朝东南向。

因未做发掘,所以辽太祖玄宫的形制结构以及规模大小等都不清楚。参考辽庆陵和耶律李胡墓的形制结构,推测辽太祖玄宫应为前中后三正殿,附有四个或六个侧殿的类屋式墓。

2. 番酋像群 番酋像群位于南岭的北侧、辽太祖玄宫封土丘的南缘,仅有两个石翁仲和一只石犬。可识别的较完整的石翁仲,头部及左臂已残失,身穿窄袖长袍,束腰带挽出双结,左手握右腕于腹前,后背拖一条长辫,足登靴,立于石座上(图八)。紧贴这个石翁仲底座西侧还有一只石雕卧犬。

因长辫石翁仲不是常见髡发的契丹人形象,所以推测这个立于辽太祖玄宫南侧的外族权贵人物形象,很可能是模仿唐陵而设立的番酋像。可惜另一石翁仲的形象无法识别。

3. 祔葬墓献殿等遗存 辽祖陵陵园的北山峰中部,有一道向南延伸的山岭。在山岭的南端地势较为平缓。祔葬墓献殿(即三号建筑基址)坐落在这道山岭南端平缓的坡地上,东、南和西面为陡坡(图三)。献殿基址由夯土台基和台基上建筑组成。台基倚靠北侧自然山体,南部用夯土修筑取平。近方形台基南北长 28.6、东西宽 27.25、南侧高约 4.63 米。台基东、南、西三壁面都用长方形砖包砌,外有砖铺散水。台基上建筑因未发掘,整体形制结构不详,仅局部揭露出台基上的铺砖地面、石柱础和砖砌墙体等现象。

参考耶律李胡墓献殿的情况推测,此献殿西北部应存在一座重要的祔葬墓。

(五)陵园内排水设施

排水设施是辽祖陵陵园的有机组成部分。陵园内地势北高南低,西高东低。根据考古调查,陵园的东北沟和西北沟都是较深的冲沟,可能是辽祖陵陵园内的排水设施。这两条冲沟交汇后,沿陵园内东山角下由北向南流,直通黑龙门水道中。需要指出的是,在黑龙门北侧不远处有一个凿山而成的深蓄水池,水池平面略呈长方形,上有桥连接南北(图三)。这个深蓄水池应是陵园内排水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能与缓解山洪对陵门排水涵洞的冲击有关。

根据考古调查和试掘,黑龙门陵门西隔墙和西墩台之间现有一条范围较大的冲沟穿过。冲沟底部存在一个过水涵洞,宽约 3 米,深度不详。这是黑龙门西门道下部的排水设施。另外,在黑龙门中门道内侧正北方约 7 米处有两块巨大的裸露自然基岩,局部表面有凿琢痕迹。值得注



图八 玄宫南侧石翁仲

意的是，这两块基岩间有一条宽约2米的沟槽，两壁凿琢基岩而成。从沟槽的走向看，可与陵门下的过水涵洞连为一体，因此该沟槽应是陵园陵门口的排水道。其上应有木桥一类设施。

陵园内的排水，通过黑龙门陵门底部的过水涵洞出陵园，东南注入季节河中。

(六)其他附属遗存

辽祖陵陵园内除了前述重要遗存外，还有诸多附属的遗迹现象，择要介绍如下。

1. 山洞 在太祖陵玄宫所在山岭的北面，即陵园西垣西北部的山峰悬崖上，有一个山洞，南北宽8、东西进深6.5、内高约4米。山洞壁面和顶部有工具痕，为人工开凿无疑。在洞口处北侧墙壁有几处人为磨光痕迹，十分明显，当是人类活动频繁所致。洞内地面有沟纹砖和灰陶片，还有一件石磨石。从采集遗物看，此洞应是辽代开凿，与辽祖陵营建有关。

2. 天梯山及其山口 在辽祖陵陵园西垣的西北部，即山洞北侧的陡峭上，有一处两壁陡直的豁口，有明显人工开凿迹象。豁口内用石块垒砌成石墙，残存9米多高，内侧较平砌。此山口位于辽太祖玄宫之西北，与黑龙门大体呈三点一线，位置特殊且重要。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生前称天皇帝，谥为昇天皇帝，而且《辽史·地理志》记载辽祖陵有天梯

之山,因此推定,此山口所在之山峰可能就是《辽史》所载之天梯山。在辽太祖玄宫之后面山脊上开凿豁口,再封堵,可能寓意此山口是辽太祖升天之通道。

此外,在内陵区还发现一些人工修筑的平台等设施,都应是陵园的附属建筑。

五 辽祖陵陵寝制度的初步认识

关于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研究虽有不少^{〔1〕},但多概而论之,难有对陵寝制度给予较清晰的界定^{〔2〕}。本文的陵寝制度是指古代皇帝崩后的祭祀礼制(“丧”)和埋葬规制(“葬”)的综合体。陵寝制度涉及内容很多,既有物质层面,也含精神层面。文献记载有些丧葬过程中的祭祀礼仪和制度,无法通过考古学手段来反映;而有些考古发现的现象恰是文献所没有记载的陵寝制度的重要内容。

本文从考古学视角探讨辽祖陵陵寝制度,主要内容包括辽祖陵选址规划、辽祖陵陵区相关的地上建筑设施和玄宫制度等。其陵区地上建筑设施的核心是陵园制度,还包括奉陵邑制度、陪葬墓制度、陵区祭祀基址、神道及其碑楼等设置等。辽祖陵玄宫制度可以认知的内容有择地埋葬方式、地表封土情况、玄宫形制规模蠡测等。

关于辽代皇帝陵寝制度的文献记载很少。最重要的是《辽史·礼志二》“凶仪”条载:

丧葬仪:圣宗崩,兴宗哭临于蕞涂殿。大行之夕四鼓终,皇帝率群臣入,枢前三致奠。奉枢出殿之西北门,就輶辂车,藉以素裯。巫者祓除之。诘旦,发引,至祭所,凡五致奠。太巫祈禳。皇族、外戚、大臣、诸京官以次致祭。乃以衣、弓矢、鞍勒、图画、马驼、仪卫等物皆燔之。至山陵,葬毕,上哀册。皇帝御幄,命改火,面火致奠,三拜。又东向,再拜天地讫,乘马,率送葬者过神门之木乃下,东向又再拜。翼日诘旦,率群臣、命妇诣山陵,行初奠之礼。升御容殿,受遗赐。又翼日,再奠如初。兴宗崩,道宗亲择地以葬。道宗崩,蕞涂于游仙殿,有司奉丧服。天祚皇帝问礼于总知翰林院事耶律固,始服斩衰;皇族、外戚、使相、矮墩官及郎君服如之;徐官及承应人皆白帛衣巾以入,哭临。惕隐、三父房,南府宰相、遥辇常充、九奚首郎君、夷离毕、国舅详稳、十闾撒郎君、南院大王、郎君,各以次荐奠,进鞍马、衣裘、犀玉带等物,表列其数。读讫,焚表。诸国所贖器服,亲王、诸京留守奠祭,进贖物亦如之。先帝小敛前一日,皇帝丧服上香,奠酒,哭临。其夜,北院枢密使、契丹行宫都部署入,小敛。翼日,遣北院枢密副使、林牙,以所贖器服,置之幽宫。灵枢升车,亲王推之,至食殿之次。盖辽国旧俗,于此刑羖羊以祭。皇族、外戚、诸京州官以次致祭。至葬所,灵枢降车,就鞶,皇

〔1〕 杨宽先生最早对中国古代陵寝制度进行了系统梳理和研究,但没有明确陵寝制度研究内容。参见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2〕 刘毅先生在研究明代帝王陵墓时,较早对陵寝制度研究内容进行了较为清楚的概括,为本文所借鉴。参见刘毅:《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1—7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

帝免丧服，步引至长福冈。是夕，皇帝入陵寝，授遗物于皇族、外戚及诸大臣，乃出。命以先帝寝幄，过于陵前神门之木。帝不亲往，遣近侍冠服赴之。初奠，皇帝、皇后率皇族、外戚、使相、节度使、夫人以上命妇皆拜祭，循陵三匝而降。再奠，如初。辞陵而还。

《辽史》记载的辽圣宗等皇帝的丧葬礼仪，在考古学上大多无法验证，但可据以推定辽太祖下葬时会有类似的礼仪。

辽祖陵遗址是辽代第一个皇帝耶律阿保机的陵寝，其营建规制在辽代具有开创意义。今将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结合，借助其他学科的相关成果，尝试从考古学视角对辽祖陵陵寝制度的主要内容进行初步归纳。

（一）选址和规划理念

秦汉时期皇帝有生前选定陵寝的传统，唐太宗和唐玄宗都曾生前选定陵寝之地^{〔1〕}。辽圣宗皇帝等也有类似情况。《辽史·地理志》上京道载：

庆州，玄宁军，上，节度。本太保山黑河之地，严谷险峻。……圣宗秋畋，爱其奇秀，建号庆州。……庆云山，本黑岭也。圣宗驻蹕，爱美曰：“吾万岁后，当葬此。”兴宗遵遗命，建永庆陵。

唐顺宗丰陵、宪宗景陵和唐宣宗贞陵则是在皇帝崩后修建的，其中顺宗和宣宗是在驾崩后七个月内入葬陵寝^{〔2〕}，说明唐朝皇帝的陵寝之地也有驾崩后选定的情况。

《辽史·太祖本纪》载：

（天显元年七月）甲戌，次扶馀府，上不豫。是夕，大星陨于幄前。辛巳平旦，子城上见黄龙缭绕，可长一里，光耀夺目，入于行宫。有紫黑气蔽天，逾日乃散。是日，上崩，年五十五。……（八月）甲午，皇后奉梓宫西还。……（九月）丁卯，梓宫至皇都，权殡于子城西北。己巳，上谥昇天皇帝，庙号太祖。……（天显）二年八月丁酉，葬太祖皇帝于祖陵，置祖州天城军节度使以奉陵寝。

可知，耶律阿保机崩于天显元年（926年）七月，九月皇帝梓宫运到辽皇都（即辽上京）地区，“殡于子城西北”。天显二年（927年）八月丁酉葬于祖陵，灵柩停放达十一个月之久，或许表明辽太祖陵是耶律阿保机驾崩后才选址修建的。

1. 辽祖陵选址 “唐宋时代的墓葬形制和埋葬习俗，在很多地方都是根据当时的堪輿家所规定的制度来安排的，特别是在葬式、随葬明器、墓地的选择和墓区的地面建筑等方面，与堪輿术的关系极为密切。”^{〔3〕} 唐贞观年间吕才编著的《阴阳书》和北宋王洙等编著的《重校正地理新书》，是中国历史上两次大规模的官修堪輿书籍。唐代阴阳五行家众多，其中上层社会堪輿

〔1〕 沈睿文：《唐陵的布局：空间与秩序》，46—5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2〕 沈睿文：《唐陵的布局：空间与秩序》，53、5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3〕 徐莘芳：《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读〈大汉原陵秘葬经〉札记》，《中国历史考古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书中颇具代表性的除吕才《阴阳书》外,尚有一行《五音地理经》、由吾《葬经》和《天元房录葬法》等〔1〕。宋元时期著名的阴阳地理书以王洙《重校正地理新书》、张景文《大汉原陵秘葬经》和《莹原总录》最为流行〔2〕。虽然难以确定辽代统治者遵从哪类堪輿学说,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辽祖陵的葬地选择上,辽代统治者显然借鉴了唐朝陵寝制度的堪輿思想。

辽上京城始建于神册三年(918年),是辽代营建最早、最重要的首都。耶律阿保机崩后,于天显二年(927年)葬在西距上京城约二十千米的大布拉格山谷中。这与唐陵择地近都,位于都城西侧的規制相合。

辽祖陵依山傍水,负阴抱阳。陵园倚靠大兴安岭南端的山系,位于陵区的北部,四面环山,山峰险峻起伏,东侧青龙高耸,西侧白虎低圆,仅东南向有唯一的陵门,门外有案山和朝山——漫歧嘎山,形如屏风(类似朱雀)。漫歧嘎山的东侧和南侧地势开阔平缓。南侧有沙里河从西北向东南流经,在辽上京城东注入乌尔吉沐沦河。在陵区西南不远处,还有一处较大的水泊。特别是太祖玄宫所在山岭,陡峭高耸,是从陵园西垣的最高点(阴阳家称玄武)形如长龙,向东伸入陵园中央,龙首中凿有玄宫,堪称上佳吉穴。根据环境考古的研究可知,当时辽祖陵遗址的自然植被保存很好。这里是一处风景秀美的风水宝地。这些现象与唐宋堪輿术的山形地势都十分契合。

2. 辽祖陵规划理念 参考汉唐堪輿学说而选定的辽祖陵,是一处风水极佳的陵寝之地。辽朝统治者对辽祖陵的精心规划,带有明显的政治性和礼制规范,成为中国古代帝陵营建的经典个案之一。

第一,帝陵若都城是其规划理念的重要体现。丧葬制度是联系生死两界的方式。《荀子·礼论篇》载:“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故君子敬始而慎终,终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礼义之文也。……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终始一也。”《礼记·中庸》云:“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两汉以来,儒家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维系其政治权力的法宝。唐玄宗亲自为《孝经》作注,并大力倡导,以巩固皇帝家天下的长治久安。“事死如事生”,就连皇帝陵寝的营建设计也要模仿都城的规划。

有学者认为,从唐乾陵开始,唐陵陵园和墓室的平面布局已分别模仿长安城和皇帝内宫的建制设计〔3〕。也有学者系统讨论了唐太宗昭陵布局模仿唐长安城的情况,认为“昭陵山陵南麓的陪葬墓区存在有意模仿长安城皇城行为,其陵山司马院则可能模仿长安城宫城”〔4〕,并且指出“将

〔1〕 沈睿文:《唐陵的布局:空间与秩序》,64—8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2〕 徐苹芳:《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读〈大汉原陵秘葬经〉札记》,《中国历史考古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3〕 黄展岳:《中国西安、洛阳汉唐陵墓的调查与发掘》,《考古》1981年第6期。

〔4〕 沈睿文:《唐陵的布局:空间与秩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帝陵陵寝意象与长安城重合更成为此后唐陵一个重要的营造原则”。综合考古新资料，我们认为辽祖陵陵园规划设计也是模仿了辽上京城的布局，这应是承继唐代陵寝若都邑的规划理念。

辽上京城平面呈“日”字形。北城是契丹皇帝和贵族生活和理事之地，南城是汉人、商人、使节等居住之地。这种布局直接反映出辽上京城市规划之时，所体现的因俗而治，即“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统治思想。同时，辽上京北城内中部偏东，筑有近方形宫城，构成“回”字形环套式格局，并有东向中轴线。这体现的是以皇帝为核心的皇权至上的政治理念，是契丹皇帝模仿汉族皇帝营建帝都布局的真实写照〔1〕。

辽祖陵陵园平面略呈不规则椭圆形。大布拉格山谷四面环山，陵域沿自然山脊封闭而成，仅在东南部设唯一陵门黑龙门。根据前文陵园分区研究可知，南岭上人工石墙与膳堂等建筑衔接，再向东与地上的佛殿等建筑群一同形成了一道文化区域的分割线，将辽祖陵陵园分为内、外两个陵区，形如“日”字（图三）。南岭石墙以北的区域，以辽太祖玄宫为中心，为祖陵的内陵区（主陵区）；而南岭膳堂和佛殿等建筑及其以南的区域，以膳堂和耶律李胡墓为代表，为祖陵的外陵区。由此可见，辽祖陵陵园内外陵区形成的“日”字形布局，应是模仿辽上京城而设计，是帝陵若都邑规划理念的体现。这种规划理念直接影响到辽太宗的怀陵陵园〔2〕。

第二，天人合一是规划理念的核心。中国北方和内亚大陆草原游牧地区的古代民族普遍信仰萨满教，契丹族也不例外。萨满教的核心是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相信万物有灵、灵魂不灭。流行东向拜日和祭祀山神。萨满教的萨满在《辽史》称巫、大巫和太巫，可以主持各类祭祀礼仪，沟通天人，医病驱魔。《辽史》多次提及“以青牛白马祭天地”，“祠木叶山”和“祭黑山”等，亦多次记载“谒太祖陵”和“谒太祖庙”等。这些内容可能都与萨满教信仰有关。前述《辽史·礼志》记载辽圣宗丧葬祭祀时，萨满（巫、太巫）即曾参与其中。

天人合一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传统的儒家、道家都重视天人合一，强调天与人的和谐统一，追求人类和自然和谐共存。董仲舒提倡“天人合一”思想，指出为政则“逆乱顺治。”《春秋繁露·五行相生》云：“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故为治，逆之则乱，顺之则治。”辽祖陵规划理念中充满天人合一的思想。设计者将风光迤邐的大布拉格山谷体现的自然和精心规划的辽祖陵陵园体现的人为有机地融为一体，和谐统一。辽祖陵利用自然山丘做鹊台，陵园以自然山脊为陵墙，陵门依山为阙，都是法依自然。陵园依山傍水，常年有山泉流出，树木郁郁葱葱。太祖玄宫所在山岭从西垣最高耸的山峰蜿蜒伸入陵园中央，犹如卧龙之首。在龙首处凿山为殿，作为玄宫；陵门口两侧山峰峭立，形如阙楼；门口外有形如扇面的漫歧嘎山做朝山，犹如影壁于前。漫歧嘎山北麓中部的凹窝处有一处独特的低丘，上有祭祀性建筑基址，应为其案山。漫歧嘎山很可能是契丹人眼里的神山之一，是重要的祭祖场所。

〔1〕 董新林：《辽上京规制和北宋东京模式》，《考古》2019年第5期。

〔2〕 张松柏：《辽怀州怀陵调查记》，《内蒙古文物考古》总第3期，1984年。

耶律阿保机作为开国皇帝授命于天,生前称天皇帝,崩后谥昇天皇帝,奉陵邑置天城军。在太祖陵玄宫后面的山脊上开辟升天通道,名曰天梯山。而且整个陵园以太祖玄宫为核心,玄宫大体位于陵园的中央;从辽太祖玄宫经过黑龙门至漫岐嘎山北侧的案山,形成清晰的轴线布局,体现皇权至上的礼制。这些或许都是辽祖陵天人合一规划理念的物化表现。

(二) 陵园制度

陵园制度是辽祖陵陵寝制度的核心部分,但《辽史》仅寥寥数语:“太祖陵凿山为殿,曰明殿。殿南岭有膳堂,以备时祭。门曰黑龙。”考古资料不仅印证了《辽史》所载基本准确,还丰富了辽祖陵陵园制度的内容(图三)。辽祖陵陵园形制和布局特点鲜明,独具匠心。

1. 自然陵墙和陵门 椭圆形陵园以自然山脊为陵墙,是辽祖陵陵寝制度的重要特点之一。四周陵墙的山脊豁口或平缓处均砌有石墙,是堪舆思想的体现,即防止风水不外泄。

唐代陵园平面形制从初唐昭陵,到盛唐乾陵模式,转变为中唐泰陵和晚唐贞陵形制,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变化,反映了唐代陵园形制从严格规范(方形)到顺其自然(沿自然山脊形成不规则形)的转变。辽祖陵陵园的营建应是借鉴以唐宣宗贞陵为代表的晚唐陵园形制。但以自然山脊为墙,仅在豁口处用石墙封堵的特点,不同于唐代帝陵陵园大多都有人工陵垣的情况。

辽祖陵陵园仅在东南位设一座正门,即黑龙门,为一门三道的木过梁式建筑。这是辽祖陵陵寝制度的又一重要特点,与唐陵陵园开四门完全不同。

2. 玄宫前设献殿 太祖陵玄宫凿山为藏,玄宫前有巨大的封土丘。其东南的南岭上置有献殿,即《辽史》之膳堂,是日常祭祀太祖陵最重要的陵寝建筑。辽太宗怀陵及其后来的诸帝陵,帝陵玄宫的东南都有献殿建筑。甚至一些重要祔葬墓也有同样的布局,如辽祖陵耶律李胡墓的东南部配有献殿。在唐陵玄宫和宋陵皇堂建筑前都没确定有类似的献殿。

献殿等祭祀建筑多建在山岭上,是辽祖陵陵园制度的重要特点之一。辽祖陵陵园的自然地形和山势决定并限制了各类建筑的规模,导致陵园内遗迹的不对称布局。

3. 祔葬墓 辽祖陵陵园内有数座祔葬墓。外陵区祔葬有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第三子耶律李胡墓。在内陵区至少还有两座规模较大的祔葬墓。

4. 佛殿和蕃酋像 陵园内东南广场建有高等级的佛殿,是辽祖陵陵园制度的特色之一。其西侧有曲尺形登山路,通往祭祀辽太祖陵的南岭膳堂。这种陵园内设佛殿和膳堂前建曲尺形登山路的特点,与大同北魏方山永固陵的设置相仿^[1],或许说明二者可能受到相似的文化影响。契丹族毕竟是鲜卑族分支的后裔。此外,辽太祖玄宫封土丘南侧发现有蕃酋像,应该与唐朝诸帝陵的蕃酋像存在渊源^[2]。

[1] 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文物》1978年第7期;张庆捷:《北魏永固陵的考察与探讨》,《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19期,2003年。

[2] 刘庆柱、李毓芳:《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第5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沈睿文:《唐陵的布局空间与秩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简而言之，辽祖陵陵园平面呈不规则椭圆形，以自然山脊为陵墙，仅设一陵门。玄宫东南位建献殿于南岭之上，有曲尺形登山路可以登临。陵园内有皇子等祔葬墓，并设有佛殿和番酋像。可见辽祖陵陵园制度既有继承，又有创新性。

（三）奉陵邑制度

奉陵邑制度是辽祖陵陵寝制度的特色之一。位于辽祖陵陵园东南一千米处的奉陵邑祖州城，开启了辽代帝陵设置奉陵邑的规制。祖州城作为辽祖陵奉陵邑，强化了对帝陵的管理，具有唐帝陵下宫的职能。辽祖陵是否借用了西汉帝陵奉陵邑的理念，值得探讨。

（四）陪葬墓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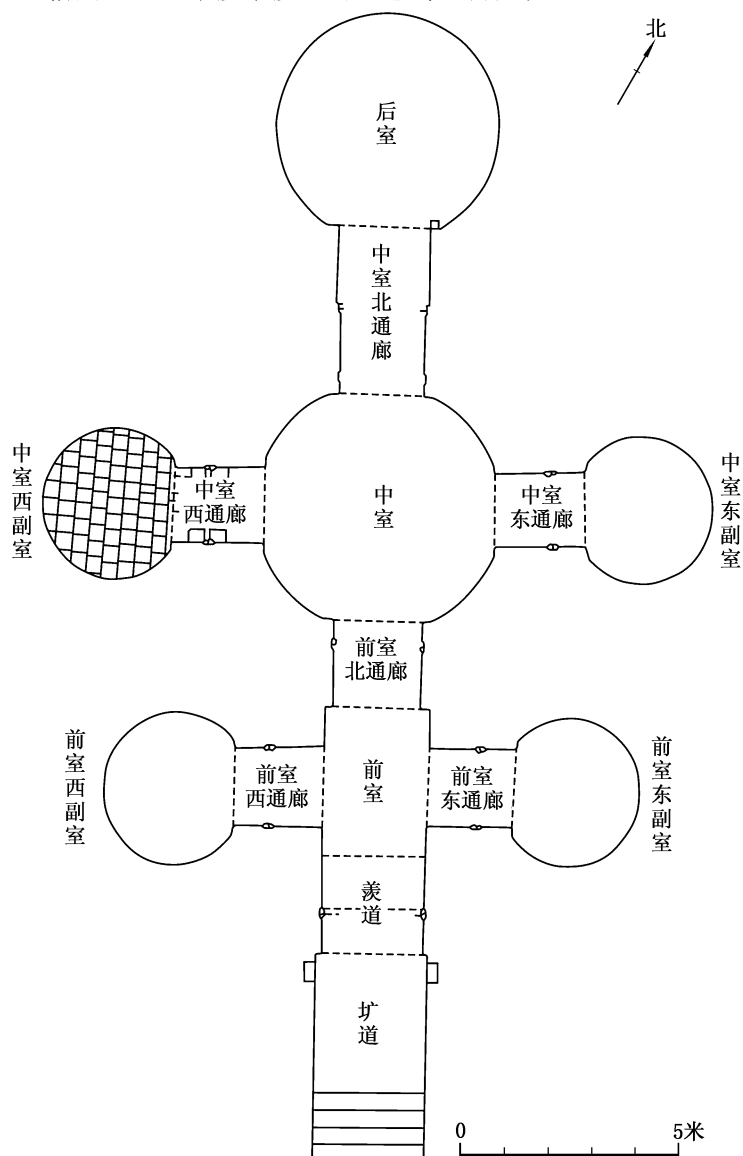
辽祖陵陵园外发现多处陪葬墓区。漫岐嘎山南麓和祖陵陵园两侧的山谷中都发现有被盗的辽代墓葬，表明辽祖陵存在陪葬墓制度。

（五）陵区祭祀建筑

在辽祖陵陵园黑龙门口外两侧，有太祖纪功碑楼、圣踪殿等多处祭祀建筑，漫岐嘎山北麓中部的低丘上也有祭祀性建筑，反映了辽祖陵的陵区祭祀制度。

（六）神道及碑楼

神道两侧没有石像生，是辽祖陵陵寝制度的特点之一。从鹊台至祖州城东南的正门，再由祖州城西北城门(后门)到祖陵陵园的黑龙门，有一条折曲的神道，是祭祀祖陵的道路。神道两侧没有发现石像生。这与唐宋帝陵陵前神道笔直，且神道两侧置石像生的情况不同。



图九 辽庆陵东陵平面图

辽州城通往祖陵陵园的南北向神道上,东侧建有太祖纪功碑楼,西侧建有圣踪殿。这种碑楼(或碑亭)和祭殿分列神道两侧的布局,可能是辽祖陵之首创,是辽祖陵陵寝制度的重要特点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孝陵中也发现类似现象〔1〕,或许不是巧合。辽代陵寝制度是否影响到了明孝陵的神道设置,值得关注。

(七)玄宫制度

玄宫制度是陵寝制度的重要内容。辽祖陵的玄宫制度包括择地埋葬方式、地表封土情况、玄宫建筑材料、形制规模、棺椁制度、敛葬方式(尸骨葬或火葬等)和随葬器物及其组合等。因为辽祖陵玄宫没有进行考古发掘,所以玄宫建筑材料、形制规模、棺椁制度、敛葬方式、丧服制度和随葬器物情况都不清楚。

据前文可知,辽祖陵是凿山为藏,在玄宫门口外有巨大的扇形封土丘,墓道大致呈东南向,这种“凿山为藏”的帝陵玄宫口有巨大封土丘的情况较为特殊,应是辽祖陵玄宫制度的重要特色之一。

辽圣宗皇帝的庆东陵玄宫是目前唯一经过考古清理的玄宫〔2〕。玄宫为砖筑七座殿堂组成的类屋式墓(图九)〔3〕,即玄宫中轴线上有前、中、后三座殿,前殿和中殿两侧各有一座配殿。除前殿外,其余各殿平面呈圆形。从陵门到后殿北壁全长 21.2 米,中殿左右配殿间距最宽 15.5 米,玄宫殿内最高 6.5 米。辽兴宗和道宗的玄宫也是砖筑七座殿堂组成的类屋式墓。略有不同的是,此二陵玄宫的主殿平面呈八角形,反映出时代特点。

我们参考辽庆陵和耶律李胡墓的形制,推测辽太祖陵玄宫“凿山为藏”,应是七座或九座殿堂组成的类屋式墓,即中轴线上有前、中、后三座正殿,正殿两侧有配殿。辽庆陵玄宫以及推定的辽祖陵玄宫规制,或许可以溯源到唐陵的玄宫形制〔4〕。

六 余 论

本文侧重考古学视角对辽祖陵陵寝制度进行了初步探讨,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这方面的“史料”。从某种意义上讲,调查和发掘的考古学资料都是新史料。

辽祖陵是辽太祖崩后选定的佳地,其选址规划基于堪舆思想,带有明显政治性和礼制观念。其以自然山脊为陵墙,平面呈椭圆形,仅设一个陵门,陵园制度独居特色;连同奉陵邑制度、

〔1〕 孟凡人:《明孝陵陵园形制布局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王仲殊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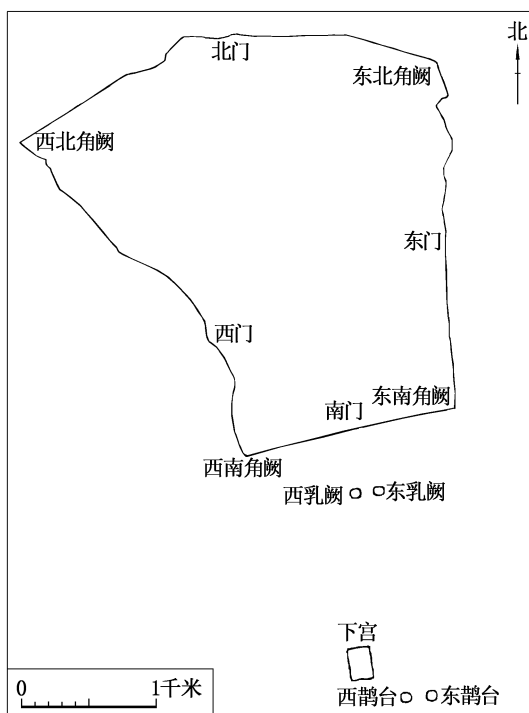
〔2〕 田村實造、小林行雄:《慶陵——東モンゴリアにおける遼代帝王陵とその壁畫に關する考古學的調査報告》,東京座右實刊行會,1952年。

〔3〕 田村實造、小林行雄:《慶陵——東モンゴリアにおける遼代帝王陵とその壁畫に關する考古學的調査報告》,東京座右實刊行會,1952年。

〔4〕 宿白:《西安地区的唐墓形制》,《文物》1995年第12期。

陪葬墓制度、陵园外设祭祀基址、曲尺形神道两侧安置碑楼和祭殿等，共同构成陵区的总体布局。辽祖陵玄宫凿山为藏，大体位于陵园中央，玄宫外有封土丘等，特点鲜明。本文归纳的辽祖陵陵寝制度主要内容和特色，或许并没有涵盖陵寝制度的全部，还需要据新资料补充深化。

若将辽祖陵与唐宣宗贞陵(图一〇)^{〔1〕}和北宋太祖永昌陵^{〔2〕}略作比较，可以认识到辽祖陵陵寝制度主要是承继唐陵的传统，如帝陵近都邑的选址理念，类似下宫职能的奉陵邑设置，陵园沿自然山脊做界分，形成不规则形平面布局，玄宫凿山为藏，位于陵园中央的规划，陵内有番酋像等。而陵园内设佛殿和膳堂前铺曲尺形登山路的特点，可能与北魏方山永固陵规制有着相似的文化来源。辽祖陵与北宋陵寝制度差异较大，属于不同的规划传统。



图一〇 唐贞陵平面图

辽祖陵开启了辽代陵寝制度的先河，其主要规制为后来辽朝诸帝陵所遵循。考察辽代其他帝陵情况可知，辽怀陵陵园规划与辽祖陵如出一辙。但从辽乾陵开始^{〔3〕}，辽代陵寝制度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综上所述，辽祖陵主要承继了唐代陵寝制度，反映出契丹统治者对汉文化的尊崇和效仿，同时又多有创新丰富，体现出北方游牧民族在丰富中华文化内涵、对中华民族国家一体性的文化认同方面所做出的独特贡献。因此可以说，以辽祖陵为代表的辽代陵寝制度是中国古代陵寝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1〕 张建林：《唐代帝陵陵园形制的发展与演变》，《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5期。

〔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宋皇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

〔3〕 锦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镇市文物管理处：《医巫闾山辽代帝陵考古取得重要收获——发现一批辽代皇家建筑基址和高等级墓葬，确定辽乾陵、显陵位置，填补辽代帝陵考古的空白》，《中国文物报》2018年3月22日第5版；《辽宁北镇市琉璃寺遗址2016—2017年发掘简报》，《考古》2019年第2期。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ZULING MAUSOLEUM OF THE LIAO DYNASTY

by

Dong Xinlin

The Zuling Mausoleum belongs to Yelü Abaoji, the founding emperor of the Liao dynasty. Its construction and regulation are the pioneer of the Liao dynasty. Based on new data from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and historical literatur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Liao Zuling Mausoleum mode. Zuling Mausoleum was chosen after the death of Emperor Taizu (Yelü Abaoji), and its site planning is based on the idea of geomancy, with obvious political and ritualistic concepts. The natural ridge of the mountain is the wall of the mausoleum, which is elliptical in shape and has only one entrance. The Zuling Mausoleum consists of mausoleum towns, subordinate tombs, outside sacrificial monuments, steles and sacrificial halls along the L-shaped sacred way. The *Xuangong*, Mortuary Palace, located in the center of the mausoleum, has a mound above. The Liao Zuling Mausoleum mainly inherited the mode of the Tang dynasty, reflecting the reverence and emulation of the Khitan rulers to the Han cultural traditions.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many innovations, demonstrating the unique contribution made by the northern nomads in enriching the connot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Han culture.

责任编辑：黄益飞